

## Queer Resistance in Popular Music: The Making of Dissident Voice in Hong Kong

Lucetta Y. L. KAM

### 酷兒的聲音：唱造香港異議空間\*

金擘路\*\*

\*感謝《文化研究》編輯部和兩位專題編輯周耀輝和何東洪的耐心和寬容，讓我得以在疫情和動盪不安中的香港完成本文；感謝評審們的意見；也感謝幫我搜集資料、細心整理和對文稿提供意見的研究助理。

\*\*金擘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

聯絡方式：lkam@hkbu.edu.hk。

## 摘 要

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經歷了一浪接一浪的民間抗爭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民間抗爭的一次標誌性運動，無論在空間、時間，或抗爭形式方面，都突破陳規，顯示出新一代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文化的創造力和多元性。在形式方面，雨傘運動的視覺展現、街頭藝術創作、音樂創作，以及和流行文化如動漫、腐文化的結合，都是前所未有的。2019年的夏天，香港爆發了比雨傘運動更激烈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

本文主要論述香港兩位公開同志身分的流行音樂歌手：黃耀明和何韻詩，通過她／他們在香港公民運動中的聲音和身影，（一）展現在香港敘事中經常缺席的同志／酷兒經驗，尤其同志／酷兒在民主運動中的參與經驗；（二）梳理和論述雨傘運動後至反修例運動期間，香港的同志／酷兒流行歌手如何通過音樂打開異議的空間。通過這些整理和討論，本文希望為香港社會運動研究提供長期被忽視和邊緣化的角度，從流行音樂和酷兒／性別的角度，拼貼2014年後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小角；以及探索2019年後在新冠疫情和國安法的雙重影響下，流行文化在香港民間異議聲音空間拓展中的角色，尤其流行音樂如何成為一種民間行動，實現連結、行動和同在的功能。

關鍵詞：香港流行音樂、黃耀明、何韻詩、創意抗爭、酷兒

## Abstract

Hong Kong after 1997 has been marked by waves of pro-democracy movements. Among them,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2014 is understood to b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tests. It signifies a shift of paradigm i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social movement. Being a territory-wide occupy movement led mainly by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it is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of its spectacular visual demonstrations, street art displays, protest music and the involvement of popular culture such as ACG fan communities. In the summer of 2019, Hong Kong has experienced another major protest, the Anti-Extradition Law Amendment Bill Movement.

In this article, I intend to narrate a (queer) story of Hong Kong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se two major social movements through the creative participation of two openly gay and lesbian Canto-pop singers, Anthony Wong and Denise Ho. This article aims at (1) making visible the experiences of tongzhi/queer people in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2) exploring the various ways tongzhi/queer singers used to open up spaces of dissident voice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lens of queer people and queer artists' participation i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ro-democracy movements, we can put gender and sexuality back to the study of Hong Kong social movements, an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opular music in pro-democratic movements. In particular, how popular music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o be a tactic used by the people to connect, act up and develop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post-2019 Hong Kong.

**Keywords: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Anthony Wong, Denise Ho, Creative Protest, Queer**

2020年11月13日的晚上，是達明一派「Replay神經 / 意難平」演唱會的首場，地點在灣仔的香港伊利沙白體育館。當晚的伊館燈火通明，門外流動著一條長長的等待入場的隊伍，一直延伸到場館旁邊的小公園。場館外一片沸騰，空氣中蕩漾著興奮和期待。香港還處於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每個入場的觀眾都需要嚴格遵守戴口罩的規定。演唱會的現場，聚集了不同的社群，有同志和酷兒，有社運人士，有跨世代的粉絲群體，有文化藝術演藝界的同行，不同背景的觀眾帶著比聽歌看表演更多的期待來參與這個盛會。

達明一派主要成員為劉以達和黃耀明，樂隊成立於中英談判展開、政治陰霾初現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香港，解散於八九六四之後，九七前夕重組；從九七後到這篇文章書寫之時（2020年末）仍斷續在香港、中國大陸和美國舉行演唱會，歌迷遍布中港臺和各地華人社群。達明一派不少作品都呈現了香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政治命運，也超前進行了流行音樂中的酷兒情慾和性別實驗（Chu 2017; de Kloet 2010）。2000年後，達明一派在香港的演唱會每每充滿政治含義，把當下的香港政治展現在舞臺上。例如2012年在香港體育館舉行的《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會》，舞臺變成當年香港的反對國民教育運動現場<sup>1</sup>；2012年香港演唱會的舞臺背景是一個用光管組成的舊式雙喇叭收音機，上面流動著網友的留言和當時香港的時代影像，有打開空間、記錄和發聲的寓意。回到2020年的香港，經歷2014年的雨傘運動<sup>2</sup>、2019年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下稱「反修例

1 這裡引用《抗命女聲》對反國教運動 / 事件的解說：「泛指2012年5月上旬至9月上旬，民眾因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而引發的一連串社會事件。該科目的《課程指引》被廣泛社會人士批判為內容偏頗、注重『情感』觸動、剝奪學校自主，為強制推行的『洗腦』教育。期間學民思潮、學聯等多個團體舉辦多次遊行、街站、聯署，於8月底發起佔領政府總部行動，並進行集會、絕食，直至政府宣布擱置推行國教科後，活動始結束。此事件促使更多年輕人關注社會事務。」（陸潔玲、孫珏2020: 184）

「當中學生佩戴著紅領巾，機械地走上舞臺上唱起“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的時候，整個演唱會被推入了高潮。達明一派選擇與學民思潮一起唱這首老歌，自然而然地將觀眾帶入了一種充滿反抗的政治性的場景中，而置身於這樣場景中的觀眾們猶如正在經歷一場反對國民教育的集會。」（蘭舒2014）

2 這裡引用《抗命女聲》對雨傘運動的解說：「Umbrella Movement，泛指於

運動」，香港民間也習慣稱之為「反送中運動」)<sup>3</sup>，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sup>4</sup>和《國安法》<sup>5</sup>的通過，達明一派的演唱會在一片低沉的社會氛圍下進行，承載了點燃希望和為香港人打氣的任務。在那短短的三個小時裡，觀眾和達明一派一起唱造了一個讓香港人發出異議聲音的空間，同時展演了一個不忘酷兒政治、性別擾亂的舞臺。

我嘗試從這個在下筆之時剛剛完結的演唱會開始，整理和思考同志／酷兒<sup>6</sup>流行歌手如何打開多元的異議空間（或空隙），和如何把酷兒的角度和性別帶入主流的社會運動場域和論述。由於篇幅所限，在本文我會主要討論香港兩位公開自己同志身分的歌手：黃耀明和何韻詩，<sup>7</sup>並根據我早前

---

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間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當時示威者持續佔領多個主要區域靜坐及遊行，包括金鐘、灣仔、銅鑼灣、旺角等。運動期間，示威者以雨傘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及催淚彈，當時外國媒體以『Umbrella Revolution』（雨傘革命）或『Umbrella Movement』報導事件，因而得名。」（陸潔玲、孫珏2020: 181）

- 3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始於2019年6月，緣起於早前一宗港人在臺灣犯下的謀殺案，香港特區政府宣佈將直接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提交香港立法會大會進行二讀，草案允許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國大陸、澳門和臺灣等司法管轄區移交犯人。社會出現大量反對聲音，反對人士上街遊行示威，引發了為期數個月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抗爭的五大訴求為「不檢控示威者、取消暴動定性、追究警隊濫權、撤回送中惡法、林鄭月娥下台」。
- 4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從中國城市武漢開始，蔓延全球。香港在當年經歷了四波疫情的襲擊，高峰期每天的確診人數過百；政府推行了限聚令、強制戴口罩、強制檢疫隔離、停課、公務員在家工作、關閉體育及文化場地等防疫措施。
- 5 《國安法》的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日（回歸三十三週年前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立即實施。《國安法》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罪名。
- 6 本文以「同志／酷兒」來表達廣義的性和性別小眾，包括同性戀、雙性戀等性傾向和身分認同，以及跨性別、性別酷兒、雙性人等性別認同；由於「同志」為自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在香港廣泛用來稱呼性和性別小眾的名稱，而「酷兒」則是相對年輕（如199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開始使用的個人性和性別表達方式，所以本文並置兩種用法。當分開使用的時候，則專指其一，比如黃耀明和何韻詩自稱為「同志」，所以會使用她／他們自己選擇的身分稱呼；當「酷兒」單一使用的時候，我主要想表達源自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置疑二元性別和異性戀常態、同性戀常態的政治主張。「性／別小眾」也會因應行文需要而採用，特別在需要包含多元性傾向和性別的個體的時候。
- 7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香港歌手和藝人現身社運的不只黃何兩位。選擇他／她們來討論，除了兩位為公開出櫃的同志，也是因為他／她們在香港社會運動中比較持續、公開和積極的參與。

airiti

進行的關於酷兒參與雨傘運動的研究（Kam 2017），在本文（一）呈現在香港敘事中經常缺席的同志／酷兒經驗，尤其他們參與民主運動的經驗；（二）梳理和論述雨傘運動後至反修例運動期間，香港的同志／酷兒流行歌手如何通過音樂打開異議的空間。通過這些整理和討論，本文希望為香港社會運動研究提供長期被忽視和邊緣化的酷兒和性／別角度；從流行音樂和酷兒／性別的角度，拼貼2014年後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小角；以及探索2019年後在疫情和國安法的雙重影響下，流行文化在香港民間異議聲音空間拓展中的角色。本文的討論焦點會放在這兩位公開出櫃的同志歌手如何通過音樂和個人的影響力，延續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民間訴求和異議聲音。當中包括同志平權的訴求，但香港同志運動的發展並不是本文的主要關注。同時要指出的是，香港除了本文討論的兩位歌手以外，還有其他藝人歌手在進行創意抗爭，選擇黃和何主要是因為她／他們是公開出櫃的同志歌手，也是目前香港最具影響力、仍然在政治問題上較為敢言的藝人。關於本文使用的一些關鍵名詞，「異議聲音」主要是指自2014以來香港民間追求政治改革和建立民主社會的訴求；「唱造」是我用來說明「反修例運動」（2019）後的一種通過流行音樂拓展和延續異議聲音和空間的民間策略，這種策略有著連結、行動和同在的功能。

## 一、香港、同志／酷兒

香港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經歷了一浪接一浪的民間抗爭運動。香港人的政治覺醒和身分認同，成為民間和學界的熱門議題。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香港民間抗爭的一次標誌性運動，無論在空間、時間，或抗爭形式方面，都突破陳規，顯示出新一代以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文化的創造力和多元性。在形式方面，雨傘運動的視覺展現、街頭藝術創作、音樂創作，以及和流行文化如動漫、腐文化的結合，都是前所未見的。雨傘運動成為不同領域的學者的研究對象，非學術類出版，例如參與者的經歷、抗爭現場的攝影集等，都在近年陸續推出。從性別角度討論雨傘運動，以及女性的參與經驗，雖然不是主流的角度，但也有專書和文章深入討論（陸

潔玲、孫珏2020)。綜觀文獻，性／別小眾，包括男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等的參與經驗，卻幾乎沒有學者進行研究。我在2017年發表的文章（Kam 2017），以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為方法，整理了性／別小眾參與者在雨傘運動的經驗，把她／他們在運動中的邊緣化經驗和異議位置，和後殖民時期的香港，進行了並置的討論。酷兒的聲音，在異性戀意識形態主導的抗爭文化中，如同香港的主體在「回歸」論述中，呈現為無力和失語的狀態（Leung 2008; 金擘路2013）。

2019年的夏天，香港爆發了比雨傘運動更激烈的「反修例運動」。黃和何為香港公開出櫃的同志藝人，長期以身體、歌聲和不迴避的同志身分，出現在香港的公民運動中。何更選擇在2012年的香港同志遊行中在街頭向群眾公開女同志的身分，出櫃宣言的地點選擇，突顯她近年在公民運動、同志平權運動中的角色。

這篇文章的分析角度和框架參考梁學思（Helen Hok-Sze Leung 2008）在著作《潛流：酷兒文化與後殖民香港》（*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中通過本土酷兒文化和創作來訴說香港故事的政治和敘事策略。酷兒慾望的不可說／不能說，和酷兒生命的飄盪不定，猶如九七前後的香港，對未知的將來充滿不安和困惑。梁提出了並置香港的酷兒文化和後殖民經驗的認識框架，把在香港敘事中經常被銷聲匿跡的酷兒經驗和文化浮現出來。十多年後的今天，經過沙士疫情<sup>8</sup>、反23條大遊行<sup>9</sup>、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洗禮的香港，民間運動蓬勃發展，但香港人卻猶如再次入櫃的酷兒，面對不可說／不能說的慾望，只能以種種流動的、創新的、靈活的方式繼續在越發狹窄和危機四伏的空間中抗爭。酷兒的經驗和政治，仍然對當下的香港有參照的意義。酷兒故事和香港故事的互相映照和糾纏，在周耀輝和高偉雲（Yiu Fai Chow and Jeroen de Kloet

---

<sup>8</sup> 沙士（SARS），又稱非典型肺炎，一般認為病毒起源於中國廣東，2003年初傳至香港，感染人數為1,755人，其中299人死亡（伍詩雅、譚嘉意2013/02）。

<sup>9</sup> 2003年，當時的香港特首董建華提出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把推翻中國政府、叛國等行為刑事化，引起社會強烈反對，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在當年7月1日以「反對23條立法」發起遊行，聲稱有約五十萬人參加，是香港九七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最後政府撤回草案。

2019) 對香港流行音樂中的酷兒政治的分析中有詳細的討論，他們認為黃耀明在2012年前後對同志身分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和策略——2012前的模稜兩可，但在2012年公開出櫃後投入同志平權運動，這種身分政治的轉變必須與香港整體的政治發展一起理解：

如果黃的個人身分迷糊和這個城市的身分迷糊是重合的，那麼，酷兒政治在2012年的香港的展現必須通過這個城市的其他政治來一起理解，比如後殖民和國族。酷兒，在這個意義上，不「單單」是關於某個地方的性小眾，而是與那個地方本身也是小眾攸關。(Chow and de Kloet 2019: 13)<sup>10</sup>

黃在2012年出櫃前的含糊策略，可以理解為一種酷兒的擾亂，拒絕將自己放在任何固定的身分位置中。不確定，也就永遠可以被「協商、重新定義和重新詮釋」(de Kloet 2010: 136)。這種含糊而開放的性傾向表達，並非沒有先例，例如張國榮。無論他的性傾向還是舞臺上的性別表演，都擾亂了二元的性和性別認識，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香港社會種種性別、政治、流行文化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交叉混合影響。何韻詩同樣在2012年公開出櫃，那一年香港同志平權運動遭到了新一輪的嚴重打擊，立法會否決議員何秀蘭提出的，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展開公眾諮詢的動議。香港酷兒/同志流行歌手對性傾向的含糊策略，反映了香港打壓性/別小眾的三大主要勢力——後殖民政府、華人家庭價值和以基督右派為主的教會系統——的影響(Kong et al. 2014; 李卓賢2015)。如果說黃和何在2012年的出櫃，是因為香港打壓性/別小眾的勢力越發猖狂，那麼，香港人走出身分的迷霧也可以理解為「小眾」在時代變革中的一次出櫃。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隨著2003年之後急遽轉變的政治生態環境，和中港融合政策與意識形態的升溫，從迷霧般的不確定逐漸走向不含糊的身分認同。尤其成長於九七後的年輕世代，更加認同香港作為主體的本土身分，他/她們如同志/酷兒般走出衣櫃，以遠較以往激進和對抗的現身策略，宣示香港的主體性。同時，同志/酷兒在香港抗爭運動中的身影和聲音，也日益清晰響亮。

---

10 外文中文譯如未特別說明皆為本文作者所作，下不贅述。

## 二、缺席的同志 / 酷兒和創意抗爭

同志 / 酷兒參與者的經驗在香港的公民運動論述中，鮮有被提及和記錄。根據我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進行的關於性 / 別小眾參與香港公民抗爭運動的經驗研究 (Kam 2017)，女男同志、跨性別者、雙性戀、酷兒、性工作者是佔領現場的一份子。在佔領現場，有活躍於同志組織和運動的參與者，有外型明顯很TB（舉止和打扮比較陽剛的女性）的女生。酷兒 / 同志參與雨傘佔領的動機除了一般的政治訴求，也包括性別和性傾向有關的目標。有女同志被訪者刻意穿上不同於主流女性形象的服飾，以宣示她的「酷兒」風格，來擾亂佔領現場的異性戀常態秩序。也有參與者將酷兒 / 同志的身分和抗爭和香港民主訴求連結起來，明顯的例子是香港跨院校酷兒 / 同志組織「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sup>11</sup>)。他們參與了2014年11月8日於雨傘佔領期間舉行的年度香港同志遊行，<sup>12</sup>在遊行行列從銅鑼灣路經金鐘佔領區時，他們的隊伍高舉「公民提名必不可少，同志平權刻不容緩」的橫幅，清晰地把同志平權和雨傘運動的政治訴求並置和連結，讓性 / 別小眾的抗爭和大眾的政治訴求連線。

2020年出版的雨傘運動紀錄書籍《抗命女聲》(陸潔玲、孫珏 2020)，收錄了16位抗爭女子的真實經歷，包括女同志、跨性別女性和腐女團體組織者的訪談。女同志伴侶Jo. Kie和Carol衝破身為同志的種種顧慮，一起參與在雨傘運動的前線。她們的顧慮反映了香港公民運動中對性 / 別小眾不友善和不信任的集體情緒，例如網上會有不歡迎同志參與政治抗爭的攻擊性留言。後來她們知道黃耀明、何韻詩和香港首位公開出櫃的立法會議員陳志全，也參與其中，才掃除顧慮，投身運動。「抗爭是為了基本生活，不爭取就不能改變。沒基本生活就沒有愛情。抗爭中不能隔

---

<sup>11</sup> 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成立於2014年3月，為跨院校的同志平權團體，旨在推動校園和社會成為同志友善環境，主張以行動實踐理念（大專同志行動Action Q | 獨立媒體〈日期不詳〉）。

<sup>12</sup> 香港同志遊行始於2008年，由民間同志團體合辦，自此除了2010年因經費不足而停辦之外，每年都會舉行，遊行路線一般位於港島區，為香港最大型的性 / 別小眾公眾活動，也吸引了亞洲區的同志和組織來港參與。關於香港同志遊行，見梁偉怡（2017）。

岸觀火〔…〕社會在公平公義制度下，才会有同志平權。」（*ibid.*: 144-145）跨性別女性阿Wing知道萬一被捕，她的性別身分會為她帶來麻煩，因為她身分證上還登記為男性。因為這個顧忌，她只負責後勤工作，駐守旺角佔領區的物資站。阿Wing的經驗體現了作為近年同志運動主要路線的同志平權意識，已經深入社群，「我覺得性小眾的工作權利被剝奪和歧視，和政府在剝奪香港人的普選權利是用一道理。」（*ibid.*: 156）同志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歧視和不理解，連結著酷兒女性參與雨傘運動的訴求。

另一方面，創意和藝術作為政治參與的方式和內容本身，在雨傘運動時期展開了一次大規模、長時間的民間自發實驗。佔領現場的即興裝置、橫幅、標語，和街頭藝術活動，大量出現在金鐘的佔領現場。例如現已成為香港抗爭標誌之一的「連儂牆」，本來是通往金鐘政府總部的天橋底下的一面平凡水泥外牆，雨傘佔領者在上面貼滿層層疊疊的彩色告示貼，把這面石牆轉化為視覺上非常震撼的巨型布告板。在幾年後的反修例運動，當長久的佔領已經不可行，源自雨傘運動的連儂牆變成抗爭遍地開花的象徵，大大小小的連儂牆在反修例運動的初期和中期出現在香港各個地區。有的甚至是大規模的集體文宣藝術巨作，例如歷時五個月的大埔「連儂隧道」，蔓延整條大埔墟火車站出口的行人隧道。從反修例運動發生的夏天，大埔連儂隧道歷經破壞和重建，一直維持到2019年的冬天。政府派員進行清洗，連儂隧道在一夜間消失了，但其後仍有零星的文宣和塗鴉，生生不息。<sup>13</sup>雨傘運動的視覺美學震撼了國際媒體，也吸引了不少學者研究（黃宇軒2018; Pang 2020; 駱穎佳2020）。黃宇軒（2018: 146）深入分析了雨傘運動中的藝術創作，尤其重視雨傘佔領區中那些「多樣、自發、由下而上、種種著重個人發揮和繁花多樣的微型實踐（micro practice）」，提出藝術作為社會運動的參與模式的論點，藝術創作不是單純的社運副產品或「花邊元素」，而是新一代政治參與的質變和政治行動的內涵本身。這種重視運動美學的「創造性參與」，一方面突顯了藝術在社會運動中的新角色，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與建制保守陣營區分你我的形象建構，讓進步陣營

13 關於大埔連儂隧道的具體發展紀錄，見梁晞文（2020/01/04）。

的年輕參與者從中建立政治認同和群體形象，以達致一種「共同感」。這種注重視覺效果和美學的自發參與方式，在反修例運動中得到更淋漓盡致的發揮。有異於雨傘的實地佔領，反修例運動沒有實體的據點，而是一場靈活多變的流水抗爭。“Be water”（如水）的運動策略，使創造性的參與變得更流動、分散、去中心化、個人化和百花齊放，無論是社交媒體上或示威遊行街頭派發的文宣，或者街頭快閃的藝術創作，都成功吸引了本地和國際媒體的注視，建構了參與者的「共同感」，體現了一種以高水平的文宣而自豪的集體認同和參與其中的共同體情感。

### 三、粉絲的政治參與

另一種同樣出現於雨傘運動的創造性參與，相對視覺藝術較少得到學者和評論者的重視，是流行文化粉絲群體的參與。在雨傘運動期間一度吸引了接近四萬Facebook追隨者的腐女團體「捍衛Lester Alex佔領巫山HeHe團」，通過Boys' Love（BL）腐女的創造性幻想，把當時兩位男性學生領袖Alex（周永康）和Lester（岑敖暉）合體稱為“Alexter”，將兩人在公開場合中的互動情慾化，幻想成BL故事中的一對情侶，在粉絲專頁上分享以他們為主角的各種創作，例如BL小說、自製音樂影片、改圖／二次創作和漫畫等；同時也持續在專頁分享抗爭的資訊和新聞。當時在佔領現場，也會零星看到一些根據Alexter而創造的文宣，例如漫畫和貼紙。Alexter的同性情慾創作，為異性戀（陽剛）男性主導的社會運動現場和論述帶來一種好玩、歡樂的酷兒變奏和重寫的可能性。HeHe團團長（一名當時二十多歲的女生）在訪談中就提及以「歡樂好玩又好笑」的形式來參與運動（陸潔玲、孫珏2020: 167），擴闊了社會運動的參與形式和成員的想像。Alexter粉絲團更突破中國大陸的資訊審查和封鎖，跨境登陸在當時最熱鬧的網上討論平臺百度貼吧（Pang 2020）。彭麗君認為Alexter的情慾能量具有越界和逾越的性質，把運動參與者黏合起來（ibid.: 83）。Alexter的同性友情所形成的粉絲效應，反映了雨傘運動的主導力量為新世代的參與者（Lavin and Zhu 2014/11/17），而BL腐女的創造性參與則展示了新世代參與社會

運動的模式轉變，通過流行文化來參與、甚至顛覆政治運動。

在粉絲研究中，有不少關於粉絲行動／起動（fandom activism）的討論，強調粉絲們以流行文化作為中介來參與社會運動，使社交媒體成為公眾人物和藝人歌星動員粉絲群體的有效媒介。新媒體時代的流行文化粉絲群體在追星和造星過程中的高度參與性，引來了學者對這些高動力高效率的粉絲群體的興趣。范佐寧（Liesbet van Zoonen 2004: 46）認為流行文化的粉絲群體具備了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條件，例如「資訊、討論和行動」。這種高度參與和互動性的追星和造星模式，例如2005年在中國大陸引起熱潮的「超級女聲」歌唱比賽，會否為社會帶來一股參與式民主的啟蒙之風，是一些論者提出的疑問和寄望。受日本動漫文化影響，如上文所討論的BL創作，和以女女情誼為主的百合文化，受眾既是流行文化的消費者，也是主動創造新文本的文化生產者，擔當著生產消費者（prosumer）的角色。以下會循著這個視流行文化受眾為主動產消者的理解，討論黃耀明／達明一派和何韻詩如何創造了讓粉絲積極投入生產新文本和參與社運的空間，以及這些抗爭空間的特性。

長期研究何韻詩和粉絲群體的李卓賢稱何為「異質的文化生產者」（idiosyncratic cultural producer，李卓賢2015: 165），她中性又多變的性別形象、遊走性別和情慾邊界的音樂和舞臺作品，以及長年被華文媒體追蹤偷窺的感情生活和性傾向，構成了她整個的明星文本。何在2012年出櫃前對性傾向的含糊態度，與香港歌手容祖兒似是而非的戀人關係，吸引了部分歌迷熱烈地分析，甚至通過幻想創作她們的愛情故事。根據李卓賢的研究，在2009年一群熱愛追蹤何容戀情的歌迷（稱為「菇祖」），成立了一個私密的網上論壇，除了討論何容關係外，也分享自製的音樂影片和小說。小說內容是「菇祖」想像中的何容戀情，大部分是同性之間的純愛，但類型非常多元（ibid.: 169）。這個論壇和何的社交媒體，成為粉絲書寫和參與另類情慾的空間。何韻詩2012年前對性傾向和感情關係的模糊態度，反映了酷兒／同志在後殖民香港的生存狀態和策略，張國榮、黃耀明和何韻詩，無不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若隱若現、在邊界徘徊游移的階段。

而這種不清不楚 / 不願清楚的狀態，激發了粉絲群爆發性的創意，積極投入書寫和想像偶像不想和不願說出來的故事。何韻詩性別形象的越界，和性傾向的撲朔迷離，構成了一個激發另類情慾想像的參與空間，以女性為主、不同性傾向的粉絲一起參與在這場女女情誼的幻想嘉年華中。這種參與式的粉絲行動，如范佐寧論述的粉絲行動 / 起動，讓粉絲團體在一定程度上預習了自發、由下而上的創造性參與，和新一代社會運動的參與和動員模式有相似之處。

#### 四、唱造異議空間

通過社交媒體、音樂作品、音樂活動和與粉絲的互動，黃耀明和何韻詩在雨傘運動及之後，繼續延續和擴展香港人的發聲空間。這小節會討論流行歌手如何在疫情和國安法籠罩下的香港，唱造出不同於主流模式的異議空間和公民參與模式。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和公民行動空間逐漸萎縮，社會瀰漫著無力感。但黃耀明和何韻詩兩位已經公開同志身分的歌手卻積極打造創造性的參與空間，無論是通過歌曲、公眾活動（例如Pink Dot HK一點粉紅、<sup>14</sup>香港同志遊行）、社區項目（例如「十八種香港」社區實驗和創作計劃，詳見下文），還是各種在街頭、線上和場館的演出，都在傳達一種希望的政治和注重連結的共同參與感。在歌曲方面，自2014年的雨傘運動開始，兩人和香港公民運動直接有聯繫的作品包括（括號內為歌曲最早的發表日期）：〈撐起雨傘〉（2014年10月4日，黃、何和葉德嫻、謝安琪、周國賢、盧凱彤等合唱）、〈是有種人〉（2015年7月21日，何韻詩）、〈親愛的黑色〉（2016年8月25日，何韻詩）、〈極夜後〉（2018年5月10日，何韻詩）、〈撐〉（2019年6月28日，黃、何和港臺群星）、

<sup>14</sup> Pink Dot HK一點粉紅沿用了始自新加坡的Pink Dot活動，在2014年開始，成為每年一度的大型公開LGBTIQ+活動。根據官方Facebook專頁的介紹，Pink Dot HK一點粉紅由「大愛同盟」（黃耀明和何韻詩為創立成員）、「愛.酷兒」和「LEZO」合辦，「提倡尊重差異，擁抱多元」為目標，對象為「不同性小眾人士和他們的支持者、盟友、家人及朋友」。活動也得到不少香港的跨國企業贊助支持，一般認為是一個非政治性的嘉年華會活動。

〈回憶有罪〉（2019年5月27日，達明一派）、〈夜行〉（2019年12月16日，Goomusic旗下歌手林聰和何韻詩合唱、合填歌詞）、〈自由之夏〉（2020年6月15日，黃耀明）、〈今天世上所有地方〉（達明一派「Replay 神經 / 意難平」演唱會第一場，2020年11月13日）。這類和香港社會狀況有關的歌曲，內容除了描述當下之外，都傳遞著一個共同的訊息，就是點燃希望，連結香港人。這些歌曲可以在網上平臺如Apple Music、何韻詩主理的文化產品網站HALL1C（成立於2005年）購買和在YouTube和KKBOX收聽，是雨傘運動以來香港流行樂壇僅有的政治異議聲音。雨傘運動後，黃和何越來越傾向通過音樂文化和創造性參與來打開另類的參與和連結可能性，例如何發起的「十八種香港」社區實驗和創作計畫，便是以深耕社區的文創方式連結社區的力量。在計畫推出初期，何撰文寫道：

「十八」，起點為香港十八區，但亦可以解讀為十八般武藝，18 ways of life。香港本應是個擁有無限可能的地方，集合中西方的最長處，只是不知從何時被規限了，個性被沖淡了。現時香港，可謂身處最狹窄的年代，做任何事好似都只有一個方法：抗爭如是，唱歌如是，拍戲如是，甚至表達自己也如是。（何韻詩 2015/06/30）

「十八種香港」的Facebook專頁在2020年10月中旬，仍然會不時分享有關香港社區創意項目和獨立經營的小店資訊，宣傳何韻詩YouTube頻道的時事清談節目，和轉發與公民運動有關的新聞和原創貼文。

黃耀明和何韻詩在社交媒體（主要為Facebook和Instagram）在雨傘運動之後仍然經常轉發關於香港政治動向的新聞和有關的音樂活動。例如黃於2017年9月為宣傳與何韻詩一起參與的「『共同體』聲援政治犯924音樂集會」<sup>15</sup>，分別在Facebook和Instagram發布了以下的文字（節錄）：

【924約定你】以音樂來改變社會

---

15 「『共同體』聲援政治犯924音樂集會」由自發義工組織「守望前線」和香港文化界於2017年9月24日於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根據活動Facebook的介紹，目標是「以音樂藝術，聲援政治犯。同時希望藉著現場攤位，在外的我們能繼承抗爭者的精神，轉化無力感為改變社區和整個社會的力量。」見：「共同體」聲援政治犯924音樂集會。2017。Retrieved from: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愛丁堡廣場/共同體聲援政治犯924音樂集會/116332879048061/> on Jan. 12, 2021.

黃耀明：「於一個這樣艱難的時期，我認為藝術或音樂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藝術和音樂能在我們失望之時，給我們很多安慰。有需要時，亦能給我們很多激勵，替我們打氣。通過創作和音樂，或許能找到更有創意的抗爭方法。別認為抗爭只有一種方式，我認為溫柔和軟性的方式都能改變社會。」<sup>16</sup>

配圖是一張黃耀明抬頭仰望、射燈光線從上面照下來的照片，可以解讀為堅守信念、保持希望的意思。這段黃的自白，清晰地表達了他藉著音樂和創作來改變社會的理念和路線，呼應著雨傘運動以來新一代探索多元和創造性的社運參與模式的實驗和實踐。

## 五、連結、抗爭、同在

回到達明一派的Replay演唱會現場，2020年冬天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香港舉行了六場演出，重溫發表於八九六四前後的兩張專輯《意難平》和《神經》。演唱會舞臺豎立了四塊巨型的垂直布幕，配合不同的歌曲，在布幕上投射不同的影像，有影響香港和中國命運的重要年分、蒙面和戴著「豬嘴」（防毒面具）的抗爭者畫像，有抗爭的符號如雨傘等，和呼應著當下的香港的歌詞節錄。香港抗爭的主題也反映在黃耀明和劉以達的舞臺服裝上，他們把自雨傘運動以來的抗爭符號——連儂牆，穿在了身上，一片片白色的正方形貼滿他們的帽子、西裝外套和褲子。那白色的空白密密麻麻，宛如無聲的吶喊，令人想起自國安法立法之後，有香港抗爭者在鬧市街頭高舉空白紙張無聲默站的行動。演唱會中段，舞臺的布幕投影出現了恍如煙花的影像，四周響起砰砰如煙花盛放的聲音，中間卻穿插著刺耳尖銳的警車聲，把觀眾的感官瞬間連接上抗爭現場的催淚彈聲音，喚起了觀眾一年前的集體聽覺記憶。眼前煙花繼續盛放，那感官的強烈對比和記憶的刺激，是一幕召喚「共同體」的舞臺實驗，效果震撼。洛楓說達明一派的演唱會是一種儀式：

當演唱會是一個儀式的時候，那是類似宗教的境界，為了鞏固一些信念、團結一些力量、浸漫一些關懷；而達明作為香港前衛

<sup>16</sup> 摘自「黃耀明 Anthony Wong」Facebook專頁（發布日期：2017年9月21日）和「wongyiuminganthony」Instagram帳號（發布日期：2017年9月23日）。

airiti

的樂隊，一直在前面帶著我走過青春的板蕩歲月，剎那我們一起長大或蒼老，他們走上香港社會抗爭運動的浪頭，便變成了同行者，見面，就是爲了互道安好。（洛楓2020/11/20）

在香港社會因爲疫情和抗爭的挫敗而處於低谷的時候，達明一派的這個演唱會打開了一個既是圍爐取暖，也是創造性參與的異議空間，儘管那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

這個演唱會所唱造出來的異議空間，具備了連結（共同體）、創意抗爭和集體同在等三種特性和效果。在連結方面，這個Replay演唱會，一如主題，通過音樂重疊／重現了不同年代的香港：八、九十年代交接的香港和當下後雨傘、反修例和後國安法的香港。一首首充滿政治所指的舊歌，彷彿穿越時空的隔代預言和對話，也像來自上個世紀盛世香港的回音，過去的迷惘、失落、失語和焦慮，重現（replay）在當下。這種世代／時代連結，也體現在達明一派新一代的歌迷或觀眾身上，從網上的討論、文章和現場所見，雖然年輕（例如九十年代之後出生的世代）的觀眾仍然是少數，但她／他們的迴響和受到的啓發卻不容忽視。<sup>17</sup>達明一派作品的政治涵意、黃耀明作爲公開出櫃的同志藝人，對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都是吸引新一代歌迷的原因。她／他們在達明一派的歌聲中聽到從未經歷過的香港、她／他們成長期時的香港本土身分建構，以及流行音樂中急速消失的異議聲音。達明一派的演唱會連結了香港的時代情緒，也連結了在現實社會中日漸割裂的新舊世代。對於新一代，尤其當黃耀明2012年公開出櫃，成爲香港同志平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達明一派的歌和黃耀明的個人實踐，在香港流行音樂裡爲性別和情慾酷兒保留了一扇珍貴窗口，抒發情感和認同。例如在Replay演唱會中，黃耀明在臺上不忘提及同志和女性主義，這些字眼和議題出現在香港的流行音樂舞臺上，以往是難以想像的。這種讓小眾（人和主義）現身的言說策略，呼召了在社會找不到認同和肯定的同志／酷兒歌迷。另外，因爲疫情，香港以外的歌迷都無法參與這次演唱會，有一班來自中國大陸的歌迷集會了自己親筆書寫的信，託人帶到了香

---

<sup>17</sup> 關於香港九十後一代寫的關於達明一派Replay演唱會的文章，見失·逃（2020/11/26）與陳嘉朗（2020/12/11）。

港。在後面幾場的演出中，黃耀明特別讀出了一些中國大陸歌迷的來信，當中有為香港人打氣的，感謝達明一派讓她／他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這種中港跨越邊境和意識形態隔閡的連結，是達明一派演唱會這個特殊的空間孕育的共同體體驗，讓社會主旋律下的邊緣者，甚至社會中不被信任的他者，得以在這個「自己人」的音樂聚會中被接納，點燃起成為共同體的火苗。

在創意抗爭方面，如上文的討論，新一代抗爭者的創造性參與在雨傘運動發揚光大，而黃耀明和何韻詩也在雨傘之後努力打開另類抗爭的空間和形式，主要以文化藝術音樂來延續抗爭和希望。駱穎佳套用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脆危性」（vulnerability）概念，分析當下的香港，認為香港需要建立「情感性的公共空間」，「我們需要更多『與』及『為』受苦他者哀悼的公共空間，一個可以透過身體的與之同在，言語、音樂及想像的物質性情感空間，讓大家彼此哀慟及照顧。」（駱穎佳2020: 130）雖然達明一派的演唱會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集體哀悼行為」，但這個通過流行音樂創造出來的空間和時間，不但創意地重現了抗爭的情感和聲音（通過上述舞臺的視覺和音響），也實現了與抗爭者同在的效果。<sup>18</sup>這個演唱會是一個用歌聲、文字和影像造就的創意抗爭空間，臺下的觀眾是主動的參與者，積極地和演出者進行情感互動，更即興把場館轉化為異議的空間。從第一場開始，演唱會尾聲的「安歌」（*encore*）時段迎來演出的一個高潮。在舞臺落幕，演出者離臺和現場燈光轉暗後，整個會場的觀眾瞬間自發點開手機的光芒。在黑暗中，某個角落傳來響徹全場的口號聲，當下猶如把時空拉回昔日的街頭，四周陸續有人回應口號，越來越多聲音加入，最後形成一片閃著燈光口號之海。觀眾席變成了舞臺，燈光、口號，此起彼落，在歌者缺席的時候觀眾自發地創造了一個屬於她／他們的

---

<sup>18</sup> 在修改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又經歷了達明一派Replay 2021演唱會，這次演唱會更突顯了「同在」和「連結」的效果。演唱會把舞臺設計成香港舊啓德機場，呼應當下香港新一波的移民潮，對比新舊香港，穿梭時空，反思當下。演唱會進行中，有觀眾從臺下獻花和送上一塊紙板，上頭印著一名現在正深陷牢獄的香港年輕異見人士的頭像，黃耀明接過花後，便把頭像紙板放在舞臺正中的位置，這一幕象徵性地讓被囚禁的異見人士得以參與演唱會，得以和觀眾「同在」和連結。

集體儀式。這個演出空檔的奇景，是觀眾集體成就的創造性參與。完場前觀眾的眾聲合奏，和整個演唱會達明一派努力唱造和重現的抗爭空間，合力完成了一次「同在」的儀式。另外，在2020年演唱會首度演唱的新歌〈今天世上所有地方〉（2020），是一首唱給世界各地同路人的作品，更加突顯了這次演唱會的同在和連結主題。達明一派的演唱會提供了一個可以實踐政治情感的集體空間，這種情感性的空間和同在感的營造，或許正在唱造、打開一些新的對話和連結的空間、力量。

## 六、結語

這篇文章延續酷兒文化研究學者並置香港和酷兒論述的香港研究脈絡，嘗試把同志／酷兒的視角和經驗加入香港的敘述和論述，以及從同志／酷兒的生存狀況來理解香港的演變。文章第二個重點是從流行音樂和創作的角度，來整理自雨傘運動開始，流行文化、音樂和創意如何成為抗爭的形式和內容，以香港同志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為討論焦點，分析同志／酷兒流行歌手如何在後雨傘的香港唱造出另類的公民參與，以及如何開發創意行動的空間，通過音樂、流行文化和社區文創，重現了被掩飾、埋沒、扭曲和消音的香港故事，也延續連結和同在的情感力量。香港正在經歷一個急劇變化和成長的階段，研究轉變中的公民參與和異議表達的方式，以及邊緣的聲音和族群，有助我們破除舊的認識框架，在看似不可能的空間、時間，發現新的連結和同在的能量。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大專同志行動 Action Q | 獨立媒體 (Inmedia Hong Kong)。〈日期不詳〉  
(n.d.)。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mediahk.net/user/action-q/> on May 30, 2022.

失·逃 (Shi Tao)。2020/11/26。〈達明一派 Reply Live —— 作為一個九十後的自白〉“Damingyipai Replay Live: zuowei yipe jiushihou

de zibai” [Tat Ming Pair Replay Live Concert: A Confession of a Post-90s], 《虛詞》 *Xuci [P-articles]*。Retrieved from: <http://p-articles.com/critics/1823.html?fbclid=IwAR38ao5OANC0Ej6OdbtyGPhuHuZfd0dVazxi12vqKGubPJufT8PZILBaPw/> on Jan. 12, 2021.

李卓賢 (Li, Cheuk Yin Eva)。2015。〈流行文化、性/別想像及酷兒空間：歌迷眼中的何韻詩〉“Liuxing wenhua, xingbie xiangxiang ji ku'er kongjian: gemi yanzhong de heyunshi” [Popular Culture, Gender and Sexual Imagination and Queer Space: Denise Ho in the Eyes of Her Fans], 《性/別政治與本土起義》 *Xing/biezhengzhi yu bentuqi yi [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 and Local Rebellion]*, 黃慧貞、蔡寶瓊 (Wong, Wai Ching and Choi, Po King) 編, 頁162-180。香港 (Hong Kong):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伍詩雅、譚嘉意 (Wu, Shiya and Tan, Jiayi)。2013/02。〈沙士十年 疫境重生 笑容再現〉“Shashi shinian yijing chongsheng xiaorong zaixian” [SARS in Ten Years: Recover and Resume after the Pandemic], 《新報人》 *Xinbaoren [The Young Reporter]*。Retrieved from: <https://sys01.lib.hkbu.edu.hk/bujspa/details.php?lang=eng&did=bujspa0000265&syr=1969&eyr=2017&tab1=pdf&tab2=article/> on Jan. 12, 2021.

何韻詩 (Denise Ho)。2015/06/30。〈十八種香港，無限種可能〉“Shibazhong xianggang, wuxianzhong keneng” [Eighteen Ways of Hong Kong, Endless Ways of Possibility], 《立場新聞》 *Lichang xinwen [Stand News]*。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ersonal/十八種香港-無限種可能/> on Jan. 12, 2021.

金晔路 (Kam, Y. L. Lucetta)。2013。〈回歸·出櫃〉“Huigui chugui” [Return, Come out], 《本土論述2012：香港新階級鬥爭》 *Bentu lunshu 2012: xianggang xinjiejidouzhen g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 2012: New Class Struggle in Hong Kong]*, 《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Journal of Local Discourse*)，頁151-160。臺北市 (Taipei):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zoth Books Co. Ltd.)。

洛楓 (Lok Fung)。2020/11/20。〈在崩塌的簷蓬下圍爐：達明Replay演唱會〉“Zai bengta de yanpengxia weilu: daming Replay yanchanghui” [Holding Each Other under a Collapsing Roof: Tat Ming Replay Concert], 《立場新聞》 *Lichang xinwen [Stand News]*。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在崩塌的簷蓬下圍爐-達明-replay-演唱會/?fbclid=IwAR2EqOp6KExlkWWaU-jypcP-zM8yDp1VtWwa\\_tD2tAK5jG1bVdvztWu3-U/](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在崩塌的簷蓬下圍爐-達明-replay-演唱會/?fbclid=IwAR2EqOp6KExlkWWaU-jypcP-zM8yDp1VtWwa_tD2tAK5jG1bVdvztWu3-U/) on Jan. 12, 2021.

陳嘉朗 (Chan, Ka Long)。2020/12/11。〈達明一派：「今天」的前衛與叛逆〉“Damingyipai: jintian de qianwei yu panni” [Tat Ming Pair: “Today’s” Transgression and Rebellion], 《立場新聞》 *Lichang xinwen [Stand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standnews.com/culture/達明一派-今天之前與叛逆/?fbclid=IwAR3OCTEnhVzx22C56UuypBCO4Hp5GqmVf7kNKHupvydC5Qxs971rDO0AAmU/> on Jan. 12, 2021.

- 黃宇軒 (Wong, Yu Hin Sampson) 。2018。〈藝術與抗爭：雨傘運動中的政治參與〉“Yishu yu kangzheng: yusanyundong zhong de zhengzhicanyu” [Art and Protes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Sheyunnianandai: xianggang zhengzhi kangzheng de guiji* [The Epoch of Social Movement: A Trajectory of Hong Kong Political Resistance]，鄭煒、袁瑋熙 (Cheng, Wai Edmund and Yuen, Wai Hei Samson) 編，頁141-156。香港 (Hong Kong)：中文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蘭舒 (Lanshu) 。2014。〈「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會」中的政治再現與符號運用〉“Damingyipai doudouzhuanzhuananyanchangchanghui zhong de zhengzhizaixian yu fuhaoyunong”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ymbols in Tat Ming Concert 2012]，〈文化研究@嶺南〉*Wenhuyanjiu@lingna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第39期。Retrieved from: [https://www.ln.edu.hk/mcsln/archive/39th\\_issue/criticism\\_05.shtml/](https://www.ln.edu.hk/mcsln/archive/39th_issue/criticism_05.shtml/) on Jan. 12, 2021.
- 梁偉怡 (Leung, Wai Yee Verdy) 。2017。〈「我的兒子是同志，你們可以和他做朋友嗎？」——記香港同志遊行〉“Wo de erzi shi tongzhi, nimen keyi he ta zoo pengyou ma? Ji Xianggang tongzhi youxing” [My son is a tongzhi. Can you make friends with him?]，〈我城我性：香港性 / 別日常〉*Wochengwoxing: xianggang xingbiericha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Everyday Hong Kong]，金擘路、曹文傑、賴婉琪 (Kam, Y. L. Lucetta, Cho, Man Kit Joseph and Lai, Yuen Ki Francisca) 編，頁126-133。香港 (Hong Kong)：圓桌精英有限公司 (Roundtable)。
- 梁晞文 (Liang Xiwen) 。2020/01/04。〈大埔連儂隧道5個月的日與夜〉“Dapuliannongsuidao wugeyue de riyue” [Tai Po Lennon Tunnel in 5 Months]，〈關鍵評論〉*Guanjian pinglun* [The News Lens]。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9631/> on May 30, 2022.
- 陸潔玲、孫珏 (Luk, Kit Ling and Sun, Jue) 編。2020。《抗命女聲》*Kangming nusheng* [Rebel Girls]。臺北市 (Taipei)：新銳文創 (Book Walker)。
- 駱穎佳 (Lok, Wing Kai Peter) 。2020。《情感資本主義：從情感獨裁到情感救贖》*Qingganzibenzhuyi: cong qinggan ducai dao qinggan jiushu* [Emotional Capitalism: From Emotional Dictatorship to Emotional Redemption]。香港 (Hong Kong)：dirty press。

二、外文書目

- Chow, Yiu Fai and Jeroen de Kloet. 2019. "Out in the Undercurrents: Queer Politics in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and Queerness*, edited by Fred Everett Maus and Sheila Whiteley, pp. 1-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u, Yiu-Wai. 2017. *Hong Kong Cantopop: A Conci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de Kloet, Jeroen. 2010.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Kam, Lucetta Y. L. 2017. "Return, Come Out: Queer Live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Hong Kong as Method*, edited by Y. W. Chu, pp. 165-178. Singapore: Springer.
- Kong, Travis S. K., Sky H. L. Lau and Eva C. Y. Li. 2014. "The Fourth Wav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Tongzhi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Sexuality Studies in East Asia*, edited by Mark McLelland and Vera Mackie, pp. 188-202. London: Routledge.
- Lavin, Maud, and Zhu Xiaorui. 2014/11/17. "Alexter: Boys' Love Meets Hong Kong Activ-ism," *F News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ttps://fnewsmagazine.com/2014/11/alexter-boys-love-meets-hong-kong-activism/> on May 30, 2022.
- Leung, Helen Hok-Sze. 2008. *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Vancouver: UBC Press.
- Pang, Laikwan. 2020. *The Appeal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Van Zoonen, Liesbet. 2004. "Imagining the Fan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1): 39-52.